



斯蒂芬·斯彭德

# 中国日记

大卫·霍克尼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英] 斯蒂芬·斯彭德 大卫·霍克尼 著 李博文 译

# China Diary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此书献给在旅途中帮助我们的格雷戈里·埃文斯

第8、29及41页下方的照片由斯蒂芬·斯彭德拍摄，第71、105及107页上方的照片由格雷戈里·埃文斯拍摄，其他插图及照片均由大卫·霍克尼完成。第6页的地图由汉尼·贝利绘制。

作者和出版商向彼得堡出版社（伦敦）的大卫·格雷夫斯表示谢意。格雷夫斯为实现本书的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 1982 Stephen Spender and David Hockney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17 by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Zhejiang Provinc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7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日记

著 者 [英] 斯蒂芬·斯彭德 大卫·霍克尼  
译 者 李博文

责任编辑 李 芳 吕逸尔  
文字编辑 郭哲渊  
责任校对 黄 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0-4976-7  
定 价 128.00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日记 / (英) 斯蒂芬·斯彭德, (英) 大卫·霍克尼著; 李博文译.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40-4976-7

I. ①中… II. ①斯… ②大… ③李…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英国—现代 ②摄影集—英国—现代 IV. ①J15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327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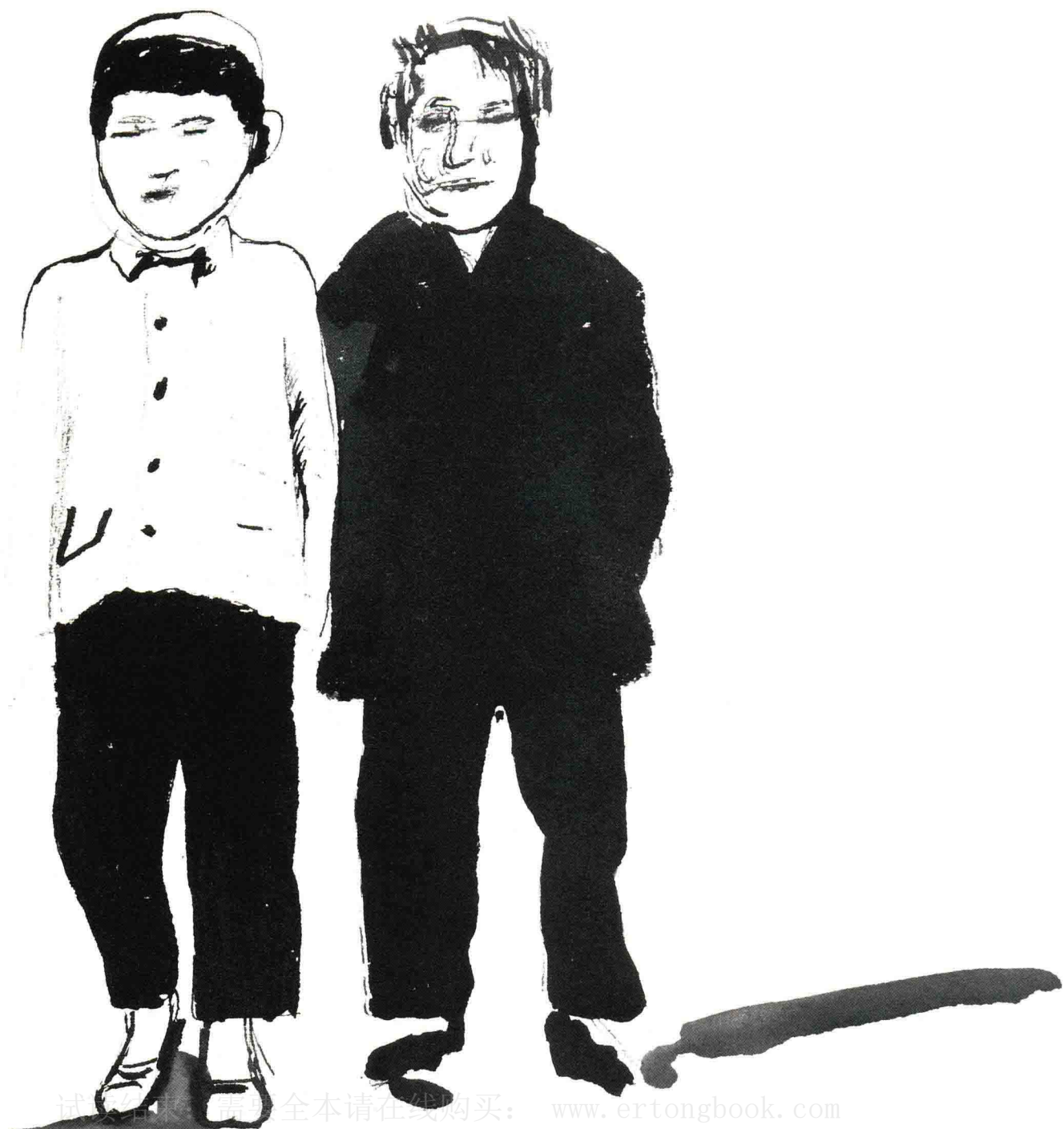
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15-349号

■关于次品(如乱页、漏页)等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严禁未经允许转载、复写复制(复印)。





[英] 斯蒂芬·斯彭德 大卫·霍克尼 著 李博文 译

# China Diary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此书献给在旅途中帮助我们的格雷戈里·埃文斯

第8、29及41页下方的照片由斯蒂芬·斯彭德拍摄，第71、105及107页上方的照片由格雷戈里·埃文斯拍摄，其他插图及照片均由大卫·霍克尼完成。第6页的地图由汉尼·贝利绘制。

作者和出版商向彼得堡出版社（伦敦）的大卫·格雷夫斯表示谢意。格雷夫斯为实现本书的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 1982 Stephen Spender and David Hockney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17 by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Zhejiang Provinc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7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日记

著者 [英] 斯蒂芬·斯彭德 大卫·霍克尼  
译者 李博文

责任编辑 李芳 吕逸尔  
文字编辑 郭哲渊  
责任校对 黄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印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40-4976-7  
定价 128.00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日记 / (英) 斯蒂芬·斯彭德, (英) 大卫·霍克尼著; 李博文译.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40-4976-7

I. ①中… II. ①斯… ②大… ③李…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英国—现代 ②摄影集—英国—现代 IV. ①J15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3278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15-349号

■关于次品(如乱页、漏页)等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严禁未经允许转载、复写复制(复印)。

# 目录

前言 7

中国日记 9

香港 13

北京 15

西安 81

南京 92

杭州 104

无锡 122

上海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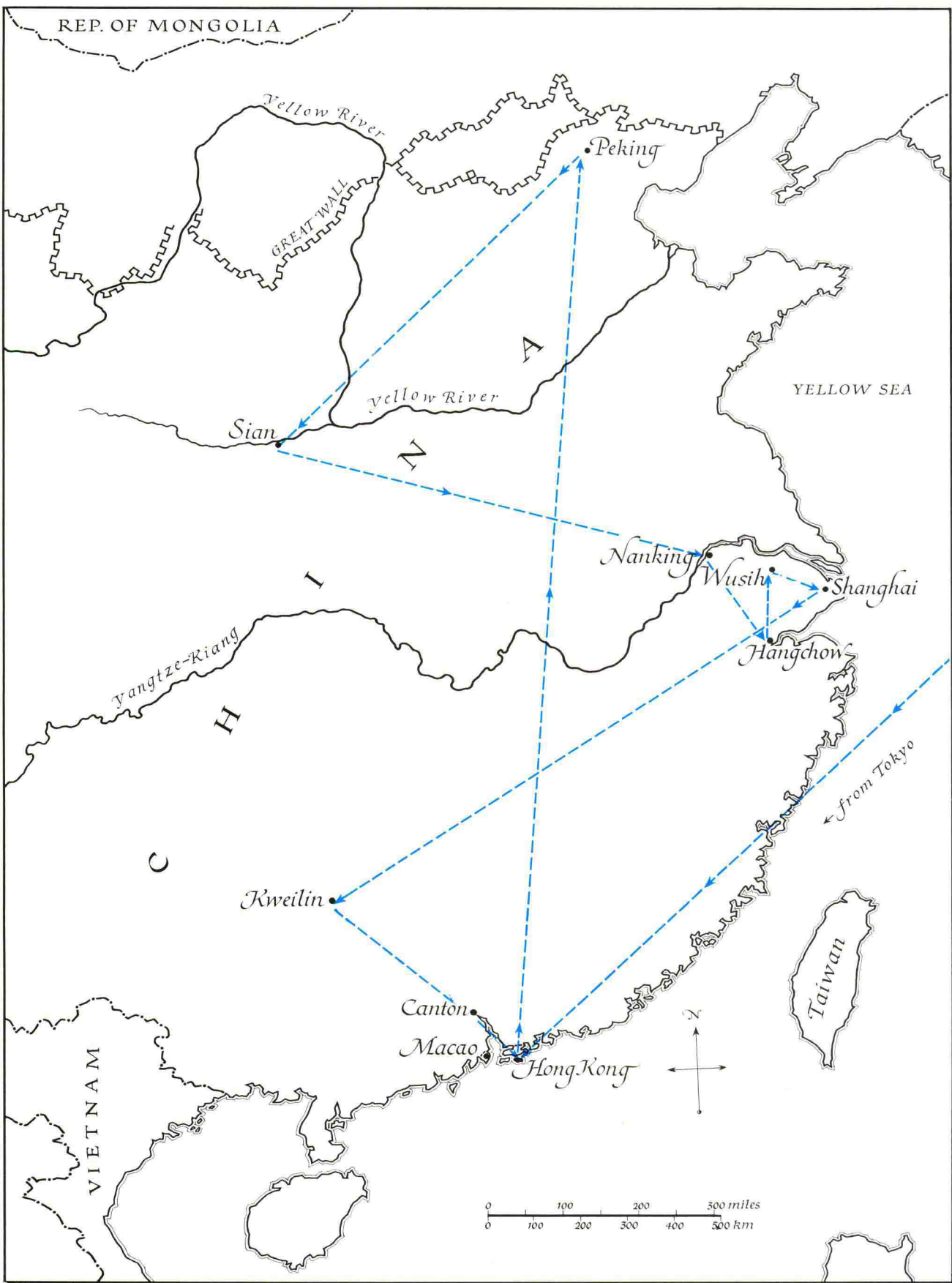
桂林 147

广州 180

后记 189







## 前言

我与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及他的助手格雷戈里·埃文斯（Gregory Evans）于1981年5月19日星期二离开了洛杉矶。离开洛杉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因烤牛肉而出名的劳瑞餐厅一起吃了晚饭。电影导演托尼·理查德森在饭桌上与我们谈起他的中国之旅。他说，他拒绝听从导游的指挥，脱离旅行团自己去了许多地方。他建议我们也这样做。

其实一年之前我们就确定了中国之行的安排，然而因为大卫在1980年秋应邀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两部独幕歌剧以及一部芭蕾舞剧——具体来说，分别是弗朗西斯·普朗克的《提瑞西阿斯的乳房》、埃里克·萨蒂的《游行》以及莫里斯·拉威尔的《孩子与魔法》——进行舞台设计创作，而不得不推迟行程。这些演出是如此的成功，我们几乎要再次推迟行程，因为大都会歌剧院又委托大卫为三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进行舞台设计：《夜莺》《春之祭》及《俄狄浦斯王》。

这本《中国日记》属于大卫·霍克尼——也属于我——在这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读者能够看到大卫的油画、纸上绘画、照片，而我也记录了他在旅途中发表的见解。我们离开中国8个月后再次于洛杉矶相聚，翻阅了所有收集的材料，回想旅行的过程，并讨论了旅行中印象深刻的部分。读者能够在《后记》中读到这些谈话的节选——其中大部分是大卫的回忆，以及关于这本书的最终呈现形式的想法。那时，大卫曾提出：“这本书可以这样开头：这只是我们几个人共同完成的一次休闲旅行。我想，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是碎片式的——就像人生一样——以某种方式编织在一起，就好像三个小学生第一次前往另一个大洲时会做的那样。我觉得这是唯一合适的方式。”

### 中文名字的拼写

尽管拼音系统已经是中国的官方拼写系统，但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倾向于使用我们更为熟悉的威妥玛式拼音法，同时在某个专有名词或人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括号内标注拼音。



斯蒂芬·斯彭德拍摄的大卫·霍克尼



大卫·霍克尼绘制的斯蒂芬·斯彭德肖像



斯蒂芬·斯彭德拍摄的格雷戈里·埃文斯

# 中国日记

1981年

5月19日

我们在这一天离开洛杉矶——大卫与格雷戈里来到康纳酒店接上我，然后开车一起前往机场。到达这个由混凝土和玻璃构成的乱糟糟的机场之后，我们很快来到候机室等待将于正午12点起飞的航班；飞机将在东京转机，飞行时间为10个小时，而后——再次在候机室等待2个小时之后——我们又将飞行5个小时，到达香港。我们与其他乘客一同坐在航空公司柜台以及两位职员对面，同航班的乘客中有一些方脸盘的日本商务人士，戴着黑色方形角质眼镜；还有带着期待神情的美国游客；也有准备将大量西方商品带回给国内家人的中国人。

中国国际旅行社是一个严谨的组织，起码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来审查我们此次旅行的计划，并最终决定让我们从东京转机并从香港入境。这或许是因为班次较少的东京至北京的直飞航班早已客满，或许是因为一些官员认为我们可以从两地的鲜明对比中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先进性（我们后来才知道，在为我们安排行程时，他们进行了许多的考虑）。

在飞机上，我随身带了三四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我坐在大卫与格雷戈里后排，时不时地拿出这些书来阅读。大卫随身带了一个便携式录音机，并时不时戴上耳机，将他自己带到一张音乐魔毯上，飞回一年前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孩子与魔法》，或飞向6个月后即即将演出的《夜莺》之中。在我们3个星期的旅程里，他经常进行这种跨越时空的音乐旅行，因为我们的中国之旅只不过是调节西方生活的一个空隙罢了。

大卫戴了一顶白色的平顶帽，穿了一件条纹毛线衫；格雷戈里穿了一件罗宾汉式的黄色无袖上衣，准确地说是淡黄色的；我则穿了一件浅黄褐色的驼毛外套以及一条深蓝色的裤子。透过他的金边眼镜，大卫目光如炬，在画画或拍照时努起嘴，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目标物上。格雷戈里看起来就像是波提切利《博士来拜》前景中年轻的佛罗伦萨贵族中的一员。大卫总是带着他的两台宾得相机，一台轻型 35 毫米黑白相机，一台宾得 110 彩色相机。我有一台 35 毫米奥林巴斯 2 代相机。大卫也有一台宝丽来相机（托尼·理查德森告诉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有一张自己的宝丽来相片——我们的经历确认这肯定是真的）。

我们在东京机场等待转机的时候，大卫为我画了一张肖像，画面中的我疲惫不堪，就像是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一样。在独自生活了 70 年之后，我想，我有一种惯常、稳定的形象，尽管在最后我可能并不能认出那就是我自己。在大卫的绘画中，我一般有着臃肿肥胖的形象：臃肿的脸颊、下巴、四肢和手指。他后期的水彩或蜡笔画通过白色毛发的衬托，确认了我整个人事实上如红肿的绵羊一般。在画中，我的双眼因血



斯蒂芬·斯彭德在东京机场

丝而变得粉红。我的一个视网膜将看到或看不到的线条扭曲成曲线，我的一个膝盖因两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而嘎吱作响（在那次意外事故中我损伤了两个膝盖处的韧带，也进行了缝针处理），我还非常高大壮硕——与两个年轻人一同旅行的我看起来一定是个怪人。很明显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三个都是非常滑稽的。这是应当被牢记的事实，因为被观察的人同时是反向观察着的观察者，而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忍俊不禁。我们看起来有些奇怪，尤其是有着巨大双脚的我。

在从东京飞往香港的航班上，我一直在阅读。我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讲话（被引用于选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而惊异。以下是一段节选：

“你们独裁。”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在 1949 年能够有先见之明，可以以 30 年后的眼光回顾自己，那么这些话在他所属的历史阶段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如果没有某种专制手段、不消除所有反动派的话，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

.....

在中国旅行时，有些想法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甚至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想，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一直是以梦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些景象

是很典型的。

……

大卫，因为我与他的年代差距——他 44 岁，而我 72 岁——他并不像我一样倾向于以 20 世纪权力斗争的历史逻辑来考虑现实。大卫曾在谈论时提到，他曾投票支持英国工党，但他不再对党派政治感兴趣。这可能部分因为，对于一位在洛杉矶和伦敦平分生活与工作时间的英国画家来说，党派政治过于狭隘了。他说，他从想象力的角度观察生活。对于他来说，想象力是某种终极力量，指引着所有事物——或者最起码，应当如此。他经常宣称“所有事物都是想象”，就好像在他脑中这种想法就是某种最高标准似的。科学则为实现想象力提供了技术手段。

有一次，我向大卫提及，某一位法国哲学家——我记得那是一位结构主义者——曾说过，来自西方的我们不可能理解中国人，因为作用于他们的整个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在作用于我们的整个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语境之外的。大卫很愤怒，“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件事，”他说，“这样的想法否定了我们共同的人性。”

我想，大卫可以被描述成一位乐观主义者，尽管我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称号。乐观主义似乎意味着某种道德短视，正与悲观主义相反。或许，更准确地说，把生活视作是一种“donnée”，一种被给予的、既定的条件，应当被享受——对于大卫来说，这种态度是一种美德，或几乎是一种道德准则。他讨厌那些总是在抱怨的人。无论如何，他认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生活都是有可取之处的。

我想，在我们的旅途中，我与大卫得以互为矫正，因为我能够向他指出，他不应当期望世上的每个人都如他一般拥有享受生活的能力；而他则能够将我从低落的倾向中拉回来，或提醒我不要太把貌似不可超越的障碍或不可解决的问题当回事，不要生活在由难以理解的事物或不可被理解的信息形成的黑云之下。在大卫前往印度旅行的时候，他经历过世界上那些貌似不能被解决的阴暗面，而我则一直在头脑中经历着这些。我们在中国时，大卫常说：无论中国的状况有多糟糕，印度的状况更坏。

大卫很喜欢洛杉矶，因为在他看来，洛杉矶处于持续转变的状态之中。他曾对抱怨洛杉矶的朋友说，明天的洛杉矶或许就不是今天你所讨厌的洛杉矶了。在我们的旅途中，大卫经常说，比起中国来，美国的情况更糟糕。因为美国有着大量的官僚，将人口分化为 30 多个阶级，统治阶层坐在灵车一般的汽车里，想要透过车窗看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从阿拉伯酋长的豪华轿车车窗中看看他们的后宫女眷们一般困难。与过

去远离百姓的生活在紫禁城中的帝王及后宫不同，在今天，中国的官员生活在公寓中做百姓的公仆。

## 5月20日 香港

我们到达香港时正是夜晚。让我们惊讶的是，接待我们的是穿着深色西装的时髦的年轻中国人，他们从入关处接上我们，并将我们带上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开向位于九龙区的半岛酒店。我们住在宽敞、豪华的套房里，房门上包有真皮。那时我想，这是为百万富翁准备的豪华房间啊。浴室里，在貌似檀香木质地（其实是塑料）的盒子里有五六种不同的香皂，每一块都是酒店管理层送给我们的礼物；还另外送了一篮奇特的水果，放在床边的一张桌子上。床是特大号的。大卫用房间内的电话打到洛杉矶去，马上就接通了。我们完全没有与外部世界脱离。

我尝了尝那水果篮子里的一个番木瓜（我觉得那是番木瓜）。在窗外的海港景观中，我能够看见天际下的香港夜景。这景象看起来就像是黑白照片的负片被并排挂在一根绳子上，群星在这些负片上方闪烁。倒映在水中的灯光像蛇一样扭动。这个晚上，我们都太累了，根本不想出去吃饭或逛街。睡觉了。

## 5月21日

早上，我们感到充满活力、警觉、兴奋，以及所有我们应有的情绪。酒店的大厅很大，充满了回音。我们在大厅旁边的大理石桌子上吃早餐。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铺着石头的走廊，以及有着玻璃橱窗的商店内的各种奢侈商品。吃过早饭后，我们在酒店旁一条宽敞的大道上散步。大道的两旁都是高楼大厦，就像是美国中西部任何一个城镇的主街一样。旁边的小街则更有意思，楼房之间的空间充斥着各种招牌，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报纸上的广告页一样。招牌上一般写着中文，但偶尔也有英文。在这些狭窄的小街上，似乎每一家商店都在售卖音响、立体声设备、录音机、珠宝或手表——我们后来知道，这些是广东地区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跟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商品价格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这是因为我不会讨价还价。在香港的乐趣好像就是在众多商店之间穿梭，找到最便宜的商家。

我们回到了维多利亚港，穿过半岛酒店以及一个看起来像是个巨大水泥蘑菇的建筑，最终到达码头。大卫特别喜欢码头，尤其是纽约市史坦顿岛码头。在那里，



人们可以欣赏到曼哈顿区独特的天际线景观。大卫说：“那是纽约市区最美丽、最廉价的观光路线；但香港的海港夜景比史坦顿岛码头的景观更加美丽。”尽管这时下着雨，我们还是上了船，坐在甲板的长凳上，注视着海港另一边的高楼大厦。雨在我们面前形成了一个滤镜，透过雨看到的大楼就像是众多古典女神组成的柱子一样，支撑着由云组成的大理石横梁。

我们从船上下来，在雨中穿过各个银行、商会及许多豪华的商店。大卫走进了一家商店，为我们买了三把折叠伞。格雷戈里做了一个简短而准确的评价——他在旅行中常作出这样的评价：“在香港，钱最重要。”

我们并没有时间享受香港的美食，因为我们要在下午2点乘飞机前往北京。事实上，我们必须马上坐船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将行李运至大堂，放到那辆劳斯莱斯上，由那一拨优雅而年轻的中国人将我们以同样盛大的方式送至机场。硕大的机场接待区域上方有一个舞台式平台，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整个停机坪的景致，玻璃幕墙的另一端有许多跑道。来自世界各国的飞机停泊在跑道上，就好像在干船坞中的船只一样，裸露着外壳。飞机机翼在摩天大楼及起伏的远山前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抽象形式。飞机机身上的文字则像是草草地写在某种铝制信封上的地址。

在这个餐厅里，我们吃到了出人意料的美味中餐——甚至比起我们接下来要吃到的那些都要好。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卫问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或跟你提到过，我关于暗箱摄影等技术对于西方艺术的影响的理论？”我说没有，他接着说：“在我看来，因为西方艺术家使用暗箱摄影等技术，他们倾向于不直接使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自然，而是通过一个单一的镜头进行观察。但这为图像徒增了许多不相关的细节。”我们在谈话时，我的脑海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象：阳光以倒V字的形式打入威尼斯的某个圆顶建筑之中，将威尼斯大运河的景观投射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每一个细节都像是瓜尔迪（Guardi）或卡纳莱托（Canaletto）画中的一样。大卫继续说：“当然了，我不知道中国画家会不会使用暗箱摄影之类的辅助技术。但在我看来，他们聚焦于眼前事物的主要形象，并去除不必要的细节。在西方，艺术家们学习日本或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因为这些国家的画家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事物的本质。”

